

高等教育发展促进高质量收入 代际流动的政策探讨*

马陆亭 刘 星 王 蕊**

【摘 要】高等教育在收入代际流动中发挥着显著作用，是受到古今中外理论和实证研究广泛验证的事实。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面对“十四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主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需要以提高投入水平和完善投入机制为基础、以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满足不同流动需求为目标、以提升学生真实能力助力个体积极向上为主要任务、以精准资助应对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为后盾，提升社会收入代际流动整体水平和有序性，提供使人人受益、人民满意的教育过程和结果。

【关键词】高等教育 收入代际流动 教育资源

收入代际流动性衡量的是个人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父代收入，反映了社会机会平等状况。^{[1]3}教育获得是当代社会代际流动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个人社会与经济地位主要通过职业、岗位实现，基本遵循劳动力市场的“能者居其位”和“按劳分配”规则，与受教育情况及其作用下的人力资本息息相关。高等教育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促进收入代际流动的重要手段，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职业人员的社会活动，对接国家经济形态、人才市场需求，对社会公平机制和受教育者的职业发展、财富收获能力起直接性作用。高等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性的互动关系紧密且复杂，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能够通过影响子代的教育获得作用于收入代际流动，已得到广泛的验证。^[2]如何利用高等教育发展政策促进收入代际流动和代际公平，开展以学理为基础的一系列政策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机制与政策研究”（19ZDA066）研究成果。

** 马陆亭，男，河南新乡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刘星（通讯作者），女，河北邢台人，教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王蕊，女，河南郑州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政策评估部主任、研究员。

一 高等教育政策促进收入代际流动的逻辑

随着国家发展进步，我国社会代际流动的活力、规律性和有序性在不断提升。对社会而言，高等教育具有培养、分类、筛选功能，通过开发个人的专业能力而帮助他们走向社会；对个体而言，在高等教育阶段获得的学历、能力，是他们参与社会流动的“敲门砖”。

（一）高等教育是打破社会阶层固化的工具

高等教育从产生之日起，就具有优化社会现有层次结构、帮助个体提升身份阶层的功能。高等教育可以打通跨阶层流动渠道，帮助个人突破阶层壁垒。改变命运和向更高层次流动，是一些年轻人追求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

我国历史上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印证了这一点。科举制一定程度上具有高等教育考试的性质^[3]，是封建统治者为了改善国家统治而采取的人才选拔、任用政策。登科及第带来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利益，包括获得俸禄、免除家族的徭役赋税等。科举制的出现，搭建了底层读书人跨越式向上流动的通道，成为打破阶层壁垒、促进收入代际流动的有力工具。

现今我国的高等教育具备公民皆可入、可用、可受益的特性，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高等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的功能性增强。以中国城镇居民子女为例，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有助于其获得高收入，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家庭子女，教育的经济地位跃升作用更大。^[4]可见，接受高等教育在当代依然是降低个人收入对父代收入的依赖性、提高收入代际流动性的重要途径。

（二）人力资本是实现个体向上流动的要素

高等教育促进代际流动的实质，是将教育影响内化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教育影响收入代际流动性的重要中间变量。受教育者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拥有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回报，实现代际流动。这一论断起源于人力资本经典学说，并被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所证实。

我国学者将子代受教育年限作为控制变量，验证人力资本对收入代际流动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我国的收入代际流动有一定的解释力并随时间有大幅增强。且在子代收入模型中加入受教育年限后，城镇样本的代际收入弹性水平下降，教育回报率则上升。^[5]

相比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重在面向所有人培养基本素质，高等教育从“入口”到“出口”都更强调个体间的差异性，教育成就主要取决于个人偏好和选

择、个体努力程度和能力水平等。分专业的培养方式能更好地发现、发展个体专长,成就高级专门人才,并通过配置到适合的职业岗位使其获取经济回报。此外,在高等教育阶段接受的专业、职业教育,可以提高个体合理分配自身资产、劳动力、时间等资源的人力资本自我配置能力,进而通过提高劳动效率效益增加个人收入。

(三) 公共教育政策是促进代际流动的基础

我国高等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的独特处还在于,高等教育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准公共产品和重大民生事业,政府注重利用高等教育投入和财政分配手段,发挥教育政策维持代际流动公平的调节功能。

综观世界各国,基于信贷约束对家庭教育投资水平的影响,公共教育投资水平高的国家整体代际流动性也高。保持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公共投入规模,配之以相对公平的招生录取和资助政策,可以保证社会各阶层最大限度地共享教育机会和福利,维护社会流动渠道的畅通。反之,当公共教育投入力度不足和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善时,教育资源更多地被高收入阶层的家庭子女占据,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将自身资源投入子女教育中,以提高子女未来的市场竞争力。^[1]父代的受教育程度容易内化为就业市场中的家庭背景“信号”,潜在拉大阶层间差距,阻碍健康有活力的收入代际流动。基于这一认识,我国不断提高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入,缩小不同阶层家庭在教育投资中的差距,尤其是帮扶低收入家庭子女在大学就学时走出经济困境和择业时减少信息闭塞,破除代际流动障碍。

二 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对收入代际流动的影响

高等教育扩张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教育政策之一。这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扩张,自世纪之交开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实现了从精英到大众化的阶段跨越,后又经历17年而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扩张,不仅使我国人力资本总量持续增加,而且让更多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从而提高就业层次,有可能进入高收入群体,提升了我国收入代际流动的整体水平。但是,这种高等教育规模和聚积效应达到一定阶段后,也有可能引发新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和代际传递问题。我们需要思考高等教育扩张与收入代际流动的互动关系,厘清其中之利害,更好地把握规律。

(一) 规模扩大显著提升了收入代际流动性

实行高等教育扩张初期,我国高校招生和录取的人数、比例大幅提高,高等教育整体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学位供给,为包括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子女在内的广大民众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流动性和收入代际流动性显著增强。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随着1999~2013年教育扩招政策的实施,我国居民受教育水平得到提高,职业阶层结构得到优化。出生于1948~1959年的人口,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重为4.8%,低收入阶层(工人和农民阶层)^①的人口占比为44.7%;在出生于1981~1990年的人口,大学及以上学历占比上升到32.8%,工人和农民阶层占比则下降为27.5%。分析内在的关联作用,受教育水平是显著变量之一。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居民的职业阶层向上流动概率,比具有小学及以下学历居民的高出24.35个百分点,高学历缓解了阶层固化问题,促进了子代职业阶层的向上流动^[6],表明高等教育扩张对于整体社会流动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二) 过度扩张对收入代际流动的潜在威胁

高等教育扩张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大学毕业人数短时期内上升过快,加之高等教育全面收费等因素,把教育选择和竞争的起始点从过去的基础教育阶段延伸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出现了大学教育回报率走低趋势。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总量增加和相对充足的背景下,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成为在社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关键。如果任由高等教育扩张进程自由发展,高收入阶层为了维持自身地位将倾向于抢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形成新的代际传递和教育不公平等社会问题,导致收入代际流动性不升反降。

多个层面的实证研究结果同样支持以上的经验分析。扩张政策对于不同收入家庭、城乡居民、不同地区的子代教育获得与回报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教育获得过程中,由于子代个体能力水平、教育投资、时间成本的影响,高收入家庭更能够发挥其经济优势,获取更多高等教育机会。而在子代教育回报率上,高等教育扩张对农村和中东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正向作用更强。应该特别注意高收入阶层在子代人力资本中的优势向隐蔽的教育质量转移,高等教育不均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并影响代际收入弹性。^{[1]30-44}

我们由此得到警示,单纯、过度增加大学招生和培养规模并不能长久、持续地促进社会流动,只有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都能公平地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时,高等教育扩张才能有效地促进收入代际流动。

(三) 扩张导致学生选择策略差异化加大

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不同收入家庭学生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预期目标表

^① 杨纯纯(2017)将来源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的样本数据中涉及的职业划分为5个阶层,即负责人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阶层、商业和服务业人员阶层、工人和农民阶层,各阶层具有的权力优势与财产优势依次减弱。这种分类次序仅限于学术研究,不带有任何歧视。

现出不同的特点,反映在教育价值观、受教育层次、专业偏好和就业领域等多个方面,且这种差异化分流趋势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而愈发明显。

人们参与代际流动的初级目标是维持与父代同等的阶层水平,高级目标是实现向更高阶层流动。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倾向于遵从现实策略,可能在完成基础教育之后即接受职业教育,以尽早离开学校参加工作、赚取收入。而来自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往往希望通过追求更高的教育,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7]面对高等教育扩张提供的更多流动途径和可能性,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展现出不同的高等教育选择策略和取向。

第一,在受教育层次的选择权上存在阶层差距。高收入家庭子女的选择权更大,定位更高,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高学历教育,相比还要考虑教育成本和经济来源问题的低收入家庭,他们更加追求自我实现。低收入家庭子女则更倾向于优先选择收益回报高和快的学历层次,适时进入劳动力市场。

第二,学生对于学科专业的选择具有阶层属性。低收入家庭子女更多选择诸如工学、计算机科学等理工类专业,这是因为相比人文社科类专业,这类专业指向技术型企业,往往对人际交往、语言技能、文化资本等依赖家庭培养的能力要求较低,有助于摆脱家庭背景因素的束缚。此外,理工类专业的职业导向更加精准明确,可以起到“安全网”的作用,保证他们能够凭借一技之长不至于坠入社会更低层。高收入家庭子女则更多地选择那些与父代出身相似,或是拥有较高社会声望、能把原生家庭背景影响力最大化的专业,例如经管类或文史类等。他们希望通过增强自身文化资本,向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展现良好知识素养和品位。

(四) 国家对高等教育公平的不懈推动

为规避规模扩张对健康的社会流动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始终重视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功用,积极制定和实施各种推动教育公平的高等教育政策,教育脱贫更是国家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从保障高等教育受教育机会公平入手,为增加贫困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给予各种形式的资助帮扶。自1999年开始实施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至今已建立了包括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学费减免、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校内勤工助学、困难补助等诸多举措在内的“奖、助、贷、勤”体系,让每个学生的“大学梦”都不落空。根据《2020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统计数据,当年资助普通高等教育学生3678.22万人次,资助金额达1243.79亿元。其中,财政资金占比为52.51%,银行发放国家助学贷款占比为30.40%,较充分保障了贫困家庭学生的入学。^[8]

另一方面,推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步确立了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教育扶贫战略，以高质量高等教育扶贫为重要推手，保证弱势阶层子女向上流动的渠道畅通。具体来说，2012年以来不断完善“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相关政策，至今已形成和实施了三大专项计划。第一，国家专项计划，即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定向招收贫困地区学生，招生学校为中央部门高校和各省（区、市）所属重点高校。第二，地方专项计划，即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定向招收各省（区、市）的农村学生。第三，高校专项计划，即农村学生单独招生计划，主要招收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十三五”时期，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累计招生近52万，困难群体受教育权利得到更好保障。在尚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重点支持建设14所高校，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9]

在诸多教育扶贫举措及其成效背后，显现出我国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代际流动中的调控功能逐渐增强。通过对弱势学生群体的倾斜政策，平衡不同收入家庭间的利益关系，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为积极的收入代际流动提供基础性保障。

三 高等教育普及化对促进收入代际流动的新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刚步入普及化阶段，恰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对接国家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未来要继续发挥高等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的正向功能，走好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的发展道路，追求人力资源的多样化和人才结构的高质量，构建与之相匹配的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创新发展、经济活力、社会公平和进取精神。

（一）要求高等教育供给更加多样化

我国人口众多，人才培养规模大是优势，但需求的增长不仅意味着量的增加，还意味着层次类型内涵等因素对高等教育的诉求更加多元。加快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多样化供给，是社会分工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和教育发展的趋势所致，也是受教育者的切实愿望。

其一，要从为国家发展提供动力支持的角度出发，做好为国家培养所需人才的“顶天大事”。根据国家总体发展目标，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等。高等教育应该紧跟经济转型的步伐，瞄准基于新兴产业的劳动力市场新增长点，尽快丰富人才培养的层次类型结构，增加、更新和调整高校学科专业门类，通过供给侧改革促进结构性就业，激发收入代际流动新活力。

其二，要从全面的高等教育事业观出发，做好满足百姓各种教育需求的“立地小事”。选择性增多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普及化阶段更是这样。人的个性特征千差万

别,对教育的需求多种多样,因此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在选择性供给、柔性衔接方面都要不断做出改善。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要“以人为本”,任何教育形态都要服从实际需要,任何满足人民需求的教育形式,都要允许其发展,以解决好民生问题。在当代中国,已经不再只有单一的教育价值取向,因家庭背景、流动目标和个人理念的不同,正在出现越来越多元化、差异化的教育选择和代际流动方式。因此,我们应当着力推动高等教育类型和层次的多样化,以满足对于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为每个阶层尤其是低收入群体阶层提供尽可能多的可能与选择。

(二) 要求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教育工作的明确要求,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整个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应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以发展内涵为重点,确保有规格、有质量、有秩序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输出。

其一,构建符合时代要求和满足国家需求的高等教育体系,应该厘清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划分,搭建合理的层次类型和内外关系。这不是要把高校分出三六九等,而是鼓励高校办出特色,在各自职能定位基础上实现和保证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和供给。“双一流”建设大学要瞄向拔尖创新人才,地方高水平大学要培养科学技术的实践创造者,应用型高校要培养知识学问的服务传播者和应用转化者,职业技术学院要造就具有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总之,要实现和确保各行各业多样化全链条高质量人才的供给,高校各司其职,学生才能各得其所进而各显其能,高等教育要推动可持续性的收入代际流动。

其二,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还要重视教育内涵的完善和提升,在思维能力培养上下功夫。创新能力的关键是思维能力,当今的高等教育需要特别加强对学生知识技能、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综合训练。这是高等教育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也是为学生做好职前准备、帮助他们更好融入和适应社会、提高代际流动能力的需要。

(三) 要求提高受教育者的职业能力

在新的产业革命来临、国家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活动对知识密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技能、能力和综合素质不足的劳动者,将面临就业不稳定、收入水平下降的风险。因此,要注重发挥高等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的功能,避免“高分低能”现象,发展学生的实际就业能力,特别是帮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掌握发展致富的本领。

其一,在教育教学安排中,应以受教育者为主体,立足“授人以渔”,赋予每个学生三个层面的真实能力。一是高级专门人才的知识储备和专业素养,用以满足专业

岗位的基本要求；二是熟练的工作和社会技能，用以胜任发展中的职业工作；三是科学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用以解决职业生涯中的各种问题。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弥补原生家庭短板，升级学生参与社会流动的动力系统。

其二，认清高等教育和职业生涯的区别与联系，帮助学生以积极的心态参与收入代际流动。高等教育是个人进入就业市场的最后一环，发挥着人力资本成型作用。但高等教育和职业生涯在核心任务上又有区别：教育是人力资本的原始积累，工作是人力资本的显现和输出；高等教育追求的是高深知识和专业能力，职业体现的是社会性和实践性文化。教育有责任引导学生做好相关的心理和能力准备，这也是提升学生参与代际流动能力和主动性的重要因素。

（四）要求经费来源更为广泛充足

投入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只有经费到位，才能确保政策成为现实、举措落地实施。

其一，要不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教育不仅是科技、经济因素，也是民生因素。研究显示，只有当公共教育支出具有一定程度连续性的时候，才能发挥出提高代际流动性的显著作用。^[10]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必须保持足够的韧性，坚持高水平的公共教育投入，持续激发整个社会代际流动的活力。

其二，积极寻找高等教育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的契合点。既要利用好公共教育体制下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和利用的主导作用，也要引入竞争机制作为补充，提高高等教育投入和资源分配效率，避免市场化滞后对公共教育供给的制约。

四 高等教育发展需激发代际正向流动活力

高等教育需要围绕高质量发展和公平促进两大政策目标，发挥人才培养高地的作用，以更加科学合理的机制，推动收入代际流动向着积极、健康、正向的方向前进。

（一）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协调好高等教育的内外部因素，使受教育者个人和国家由于教育获得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远远超过对教育的投资。

其一，丰富高等教育发展理念，致力于解决国家前进中的现实问题。在高等教育起步阶段，我们更多地吸收借鉴了世界各国的先进办学经验。随着不断地发展壮大，高等教育需要扎根于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高等学校要从习惯学习借鉴向注重自我创新的模式转变，在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中提升自我。

其二,加强高等学校的“补短板”工作,强化人才培养能力。“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在加快培养创新人才、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上发力,应用型高校要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技术服务工作,职业技术学院要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高等学校要增强社会适应性,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要注重构架普职融通、产教融合的人才成长“立交桥”。

其三,促进学生的高质量就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效能。高校要注重与社会的融合,安排教师经常性深入基层和企业实践,组织学生以多种方式参加社会实践,推动专业学习与实践教育的结合,推动就业创业工作。要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劳动光荣、勤劳致富的氛围,帮助不同的学生找到适合的工作岗位,提高就业创业成功率。

(二) 以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实现高等学校的类型多样

多样的形式和关键在于,针对不同个体的教育需求,配置相应的高等教育机构类型、学科专业和学习模式,尽可能实现让每个受教育者按需选择。这些不同的高等教育路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重在发挥和打造个人优势特长,为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活做准备。

其一,在高等院校类型的划分上,按理论型、工程型、应用型、职业型等分类方式,让学生根据个性特征各得其所,让社会根据需要充分选择。其中,理论型高校要特别加强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工程型高校要加强综合实践能力培养,应用型高校要加强知识转换能力训练,职业型高校要侧重操作能力训练。理论教学、实践运用、技能培训是所有高等学校都需要有的教育模式,但不同高校在侧重安排上要有模式意义的差异。分类有助于不同学生根据其不同流动需求与社会搭建起桥梁。

其二,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发展上,通过学科方向引导专业学习与劳动力市场的衔接。积极推动面向未来科技和产业方向的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有效促进学科融合,加强高等学校面向社会办学与产业企业交融共进,加强创新人才和实用性人才培养。

其三,在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构建上,聚焦人才能力结构需求,实现“结构化”育人。紧抓高等教育知识、技能、思维力三足鼎立核心要素,结合理论教学和实践活动,制定结构化育人教学计划,搭建知识专业类、思维开发类、技能训练类、支持扩展类课程的育人体系。不同的学校、学科专业对这些课程与教学要素的搭配可以不同,但需要都有、都做。

(三) 以多元精准资助助力学生接受最合适教育

精准的核心在于,为每个学生提供与其需求相匹配的教育,为真正需要帮助的低收入家庭子女就学提供有效的资助。

其一，做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深化教育帮扶工作。根据“双一流”建设和地方高校转型等带来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供给量的变化，制定配套政策措施，扩大面向农村及西部地区家庭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规模。

其二，开展教育帮扶需求分析，精准把握学生需要教育资助的类型，了解学生完成学业的困难点。例如，美术、音乐等艺术类专业因其特殊性，学习成本要高于其他普通专业，有可能导致一些有艺术天赋和兴趣的孩子因家庭条件原因而失去学习机会。因此，在奖、助学金或信贷提供上要精准施策，让低收入家庭子女能相对充分地做出教育选择，不因家庭经济困难限制而失去本可以属于他们的机会。同时，引导他们不要盲目拔高期望，而应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教育。

其三，做好资助育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一方面，在实施有效专业教育的同时，加强立德树人、为国成才、奋发有为、心理辅导等思想教育和励志教育，激励学生在成就事业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提升。另一方面，鼓励受资助学生回家乡或者到广大的基层干事创业，这样既能解决地方高层次人才短缺和毕业生就业难的结构矛盾，又能发挥教育资助的反哺作用，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整体代际流动水平。

（四）以强劲的教育投入扩大代际正向流动机会

强劲的用意在于，通过加大公共投入和社会投入，不断完善高等教育投入体制，为积极的社会代际流动提供坚强有力的财政支撑。

其一，确保教育投入规模持续稳定扩大，逐步引入社会资本。我国整体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已连续多年在4%以上，今后应朝着更高更稳定的方向迈进。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社会投入一直不够重视，应该尽快制定完善积极推动社会经费投入教育的政策。通过对比发达国家的情况和经验发现，如何使我们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处在GDP的4%~5%、社会投入保持在GDP的1.7%~1.9%，是我们推动实现科教兴国大业、增强代际流动活力的努力方向。^[11]

其二，推动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改革，健全高质量教育体系公共财政保障机制。压实各级政府责任，高度重视财政教育支出的占比，财政性教育经费增幅要高于GDP增幅，做到在校大学生人均公共支出预算逐年只增不减，并加强对落实情况的督导核查。

其三，平衡区域间公共教育经费和资源投入，适度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为了改善相对落后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现状，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要注意加大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完善面向西部地区农村、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定向招生计划，增加他们进入高水平大学的可能性，打通和拓宽代际向上流动的路径。

如果有注释，先放注释，再放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 [1] 亓寿伟:《代际流动视角下的子女教育获得:基于政策视角的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
- [2] 候玉娜、易全勇:《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关系(上)——基于理论视角的文献述评》,《教育学术月刊》2013年第9期,第3~12页。
- [3] 刘海峰:《论科举的高等教育考试性质》,《高等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第86~90页。
- [4] 郭丛斌、闵维方:《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教育研究》2007年第5期,第3~14页。
- [5] 陈琳、袁志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财富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99~124页。
- [6] 杨纯纯:《教育扩张对中国职业阶层代际流动性的作用机制分析》,硕士学位论文,东北财经大学,2017,第39页。
- [7] R. Breen, J. H. Goldthorpe, "Explaining educational differentials: towards a formal rational action theor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1997, 9 (3): 275-305.
- [8]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2020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人民日报》2021年9月16日,第14版。
- [9] 陈宝生:《开启建设教育强国历史新征程(人民要论·“十三五”辉煌成就·教育)》,《人民日报》2020年9月10日,第9版。
- [10] Leonard M. Lopoo, Susan E. Mayer,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8, 92 (1/2): 139-158.
- [11] 马陆亭、徐孝民:《国际教育投入与学生资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第7~9页。

Discussions on the Policies for the High-quality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Facilita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a Luting, Liu Xing, Wang Rui

Abstract: The fact that higher educ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has been widely verified by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Entering the stage of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under the them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rmulated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needs to improve its investment level and mechanism

as its foundation, take meeting various demand by building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s its goal, promote students' ability and their individual improvement as its major task, and address the imbalance of education resources through targeted funding as its backing force. Thus we can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and order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and provide education process and results which benefit everyone and satisfy the people.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Education Resource